

读书,
让你更有力量

全民阅读

【阅读二战·回忆反思】

破碎的回忆——
“大咖”们记忆里的二战

□王昱

二战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死难人数最多的一场浩劫,不少亲历的将军、统帅都在回忆录中进行了叙述。然而,把这些回忆拼在一起,你会发现有关二战的描述成为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罗生门”。二战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在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中其实你找不到,但品味这些回忆录,未尝不也是一种读书的乐趣。

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经拍过一部比他本人更著名的影片《罗生门》,讲一起谋杀案发生后,追捕找来各个当事人谈话,却发现没有任何两套证词是对得上号的。所有人都按照自己的立场扭曲了对事件的回忆,事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人们永远无从知晓。亦或者说,对于那场竹林中的谋杀案,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真相”。而互相矛盾的回忆,反而成为了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

回忆就是这样,即便你带着十二万分的真诚去讲述“真相”,那也只是你自己的真相。

将这个有趣的故事套入人类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就越有可能成为一场“罗生门”。比如二战,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死难人数最多的一场浩劫,不少亲历的将军、统帅都在回忆录中进行了叙述。然而,把这些回忆拼在一起,你会发现有关二战的描述成为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罗生门”。二战的真相到底是怎样

的,在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中其实你找不到,但品味这些回忆录,未尝不也是一种读书的乐趣。

在亲历者的回忆录中,若以文笔论高下,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大概无人能出其右,毕竟该书为丘吉尔赢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抛开文笔不谈,这本书似乎也该算偏见最多的一本,曾经辉煌的大英帝国虽然赢得了二战,却在其中赔光了最后的家底,不复当年荣光。深爱自己祖国的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将这次“惨胜”罩上一层“史诗般壮丽”的色彩,这在文学上当然是成功的,但无疑有些自说自话,当小说看似乎更合适些,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这本回忆录颁发文学奖,也算是瑞典人跟丘吉尔玩的一个冷幽默。

与丘吉尔的回忆录类似的,还有法国总统戴高乐所撰写的《战争回忆录》,在理解戴高乐将军高尚爱国情操的基础上,对于书中各种给法兰西拔高的情节……怎么

说呢,大家就当真的听好了。

与胜利者们不同,战败国德国的将军们对二战的回忆别有一番滋味。《一个军人的回忆》和《失去的胜利》这两本书,分别由德国名将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所著。从这些书中,你能窥见纳粹德国在发动战争时复杂的动机,也能明了不少看似精明、实则愚蠢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将军都用了很多的篇幅去吐槽他们的元首希特勒是怎样在关键时刻瞎指挥的,说的好像没有这位“奥地利下士”瞎搅和,德国就能赢得二战一样。这个说法听上去像是在吹牛,不过两位名帅摆事实讲道理的功夫都挺到家,读者随着他们展开一场有关二战史的意淫,也未尝不可。

比起英法领袖的不时吹牛、德国将军的各种不服,真正在二战中出了大力的美苏两国的当事人却不爱搞什么宏大叙事。《远征欧陆》一书是美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的二战回忆录,这本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回忆录,充斥着当年

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巴顿、布莱德利、蒙哥马利等等。《远征欧陆》把西线盟军的很多战略行动背后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不过也仅止于战争本身。同样不扯废话,以就事论事风格讲二战的,还有苏联两位元帅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在《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这两本书中,二位苏联元帅的主要笔墨就是在写战争的进程,几乎就是两本战争的流水账,非军事迷切勿触碰。

美苏两国当事人,虽然意识形态迥异,但写回忆录时竟然如此相似,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冥冥中的暗示。当敌人已经能用千万倍暴力毁灭你了,再扯什么孰是孰非显然是不靠谱,还是只谈怎么打仗吧。

“在战争中,真理是最先阵亡的。”在不同亲历者的不同回忆里,我们也许无法拼出一个二战的全貌,但这支离破碎、互相矛盾的回忆,也许正是战争残酷的最好注脚。

《安妮日记》:
黑暗时代的
一段真实生命记录

□陈祥

一位曾经在二战密室中躲避战火和屠杀的犹太裔科学家回忆,多少年过去了,他依然不敢站在窗前,因为童年时曾那么惧怕被流弹击中。那些战火中的少年有的带着恐惧长大了,有的永远留在了历史的缝隙中。

“我希望可以永远保持着这张相片中的样子,这样我便可以有机会到好莱坞了。1942年10月10日。”照片中的安妮·弗兰克许下了一个愿望。很不幸,这个生于1929年的犹太女孩从未躲过纳粹的搜捕,她在1945年2月或3月因斑疹伤寒死于德国伯根-贝尔森集中营。

安妮的名字多年后传遍全世界,因为她留下一本藏于阁楼的日记,记录了黑暗时代一段真实而丰盈的生命。《时代》杂志在1999年将她列入“本世纪最重要的人”,理由是“书中的激情使所有人把安妮的地位上升到高于大屠杀、犹太教、少女时期,甚至是善良,更成为了现世代深具代表性的人物——个人道德思想受到各式各样机械式的破坏影响,坚持要求得到生存的权利,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希冀。”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13岁生日,父亲送的礼物是一带锁的记事本。安妮将它作为日记本,记录生活中的各种琐事,自己的点滴感情,学校生活、家庭细节、恋爱感受……无所不说。“我希望,我能完全信任你,我还从来没有能这样信任过谁。我也希望,你将给我最大的支持。”安妮在生日当天写下第一篇日志,她将本子当做闺蜜,取名基蒂,以写信形式写日记倾诉。

噩梦一天天逼近,1942年7月8日,安妮的姐姐玛戈收到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的通告,命令她去最近的集中营报到。父母决定全家躲入公司办公大楼的“密室”,父亲早就做好准备。姐妹俩马上收拾行李,安妮首先想到了日记本,她认为“回忆总比衣服更宝贵”。

与安妮一家四口共同入住“密室”的,还有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以及杜瑟尔医生。八人在狭小的密闭空间里战战兢兢生活了两年,白天避免发出一切声音,晚上才能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饮食起居由外面知情的6个朋友照顾。安妮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44年8月1日。8月4日德国和荷兰警察破门而入,所有人被送往集中营。9月17日,盟军开始进攻荷兰。

最终只有父亲弗兰克幸存下来,当初协助他们一家的朋友保存了安妮的日记本。翻阅亡女的日记,弗兰克无比痛苦。由于安妮多次在日记里表示想当作家,他于1947年在荷兰出版了日记,1952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从此安妮广为人知。《安妮日记》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它还被制作成多部舞台剧和电影,此书仅在中国就有多个译本。此外荷兰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把那间密室改造成“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此地遂成为一重要旅游景点。

(据《新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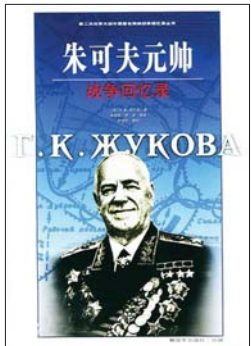
安妮·弗兰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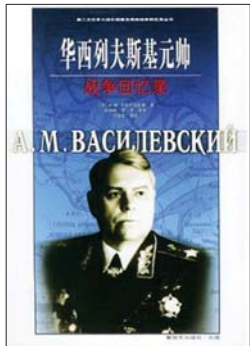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英]丘吉尔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年出版



《战争回忆录》
[法]戴高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苏]朱可夫 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03年出版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
[苏]华西列夫斯基 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03年出版

《零年》:
承认和忏悔历史之恶,
是文明社会的共识

□李公明



《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

读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的《零年:1945 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不期然地想起个人与历史叙事中的“年份”问题的相遇。书名以1945年

理论上的反思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如何从思想、道德、法治乃至日常人伦中清除法西斯暴政的精神流毒,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极为复杂,其中充满种种政治道德上的冲突与暧昧。布鲁玛书中的第五章“沥干毒药”,对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的叙述与分析十分精彩,从抵抗运动的被刻意美化与弄虚作假,再到清算的对象、范围、方式和效果,从正义的普世性质到意识形态的政治分歧实质,“毒药”无处不在,“沥干”谈何容易。而他提出的问题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战后新秩序要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就必须清算过去的罪责。“但这项工作该从哪儿着手呢?如何推进?又怎么定义罪行?帮凶不应该也受到清算?到哪儿去找有罪的人?要不要适可而止?如果每一个曾做过纳粹或和纳粹合作过的德国官员都要被清洗,已经风雨飘摇的德国社会很可能就此分崩离析。因为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有些审判成为了充满各种复杂动机的表演甚至闹剧。但是即便如此,战后重建的历史不能够缺少这一环节,正义的伸张不能缺少最

起码的仪式,而且在这场历史大审判中不乏清醒的理想主义者。罗伯特·杰克逊是纽伦堡审判中的一位主要公诉人,他相信审判不只是定罪量刑和惩罚有罪之人的一场演练,他相信自己是在为文明代言;他还清醒地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审判这些被告的依据将被明日历史用来评价我们。给这些被告一杯毒酒,等于向我们自己嘴里灌酒。”

读布鲁玛的《零年》,最好是与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合读。朱特在“跋:来自死者之屋——论现代欧洲的记忆”中指出,承认和忏悔历史上的国家罪恶,是进入当代公共生活无法逃避的途径,“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另外,关于“受害者叙事”,他认为必须首先要解决“受害者叙事”的合法性都受到极大的遏制和漠视的问题,但同时要警惕对受害者的纪念发展到物极必反的地步。

(据《东方早报》)

为“零年”,这是典型的德国式说法。“零年”不是“0年”,因为在历法中的公历中并没有“0年”,“零年”实际上是“元年”之意。“零点时刻”是二战结束后德国流行的一种说法,以这个源自军事上的术语描述德国陷入历史的终结与一切的开端,整个精神和物质世界都必须从零开始。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对纳粹暴政的反思和批判并非开始于1945这个“零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思想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就已开始了。而在1945年,远比